

邓广铭全集

第一卷

邓广铭全集

第一卷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韩世忠年谱

辛稼轩年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广铭全集 / 邓广铭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4

ISBN 7 - 5434 - 5900 - 0

I . 邓… II . 邓… III . ① 邓广铭 - 全集 ② 中国 古代史 - 研究 - 宋代 - 文集 IV . K244.0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751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496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434 - 5900 - 0 / K · 268
定 价 750.00 元 (共十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8641271, 8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一九九五年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寓所



一九三〇年，时年二十三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与窦珍茹结婚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摄于中山公园（左起第一人为邓广铭）



一九五八年与夫人窦珍茹和女儿可因、可蕴、小南



一九八一年与林耀华在寓所客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在洪业先生学术纪念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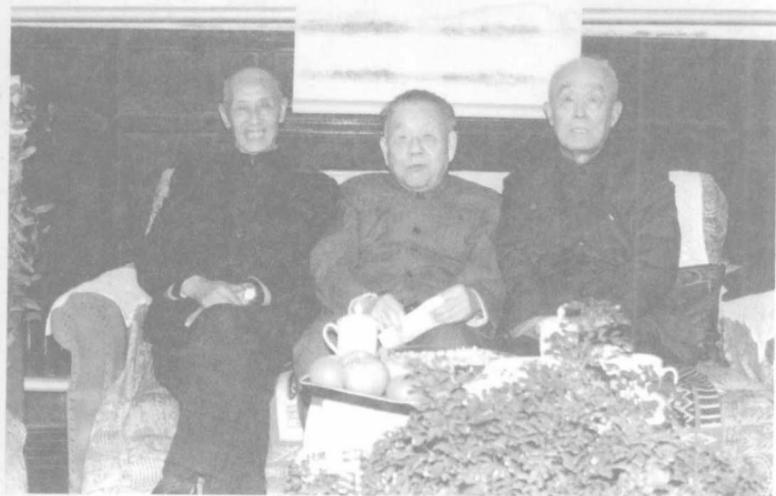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与柳田节子、斯波义信、梅原郁、李弘祺摄于
北京大学、杭州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宋史国际研讨会期间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摄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宋史研讨会期间。一排左起漆侠、郦家驹、陈乐素、刘子健、邓广铭、张春树、宋晞、全汉昇、张骆雪伦，二排左四王德毅



一九五二年八十五寿辰与学生们摄于朗润园



一九九四年与老友臧克家、季羡林共度春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与周一良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活动



一九九一年与田浩、贾志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一九九三年春节与启功、刘乃和、叶嘉莹在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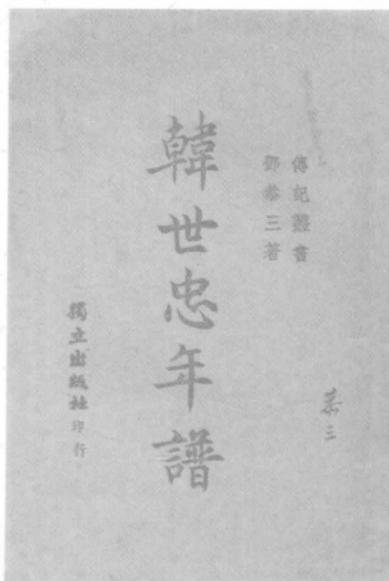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八十寿辰在朗润园



《王安石》各种版次书影



一九九五年修订《辛稼轩年谱》
时与助手戴静华摄于北京大学寓所



《韩世忠年谱》书影



《辛稼軒年譜》书影



部分著作书影

前　　言

《邓广铭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桩盛事。

个人著作结集行世，滥觞于东汉，盛行于唐宋以后，可谓源远流长。这些文集所表现的不仅是作者的事功、性情、议论、文采，而且也是人类智慧的累积。清代著名学者纪昀说：“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现代学术超迈往古，但文章要经受时间考验，只有少数著作可以传世行远，仍是不刊之论。

邓广铭（恭三）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学界誉为“宋史泰斗”、“一代宗师”。他早年师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先生，毕生求索上下古今，著述宏富，主要研究范围则在宋辽金史，尤专精于宋史。先生初登史坛，就以宋史研究成果一鸣惊人，深得胡适先生称许。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陈先生的盛赞和厚望，是当时青年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赞誉“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半个多世纪之后，周一良先生评价说：邓先生可谓“吃透了”宋史，实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并世诸贤治断代史者似罕有人能与之同样全面而深入地专精一个

时代”。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但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还获得文学界的推崇。茅盾先生就曾赞誉《稼轩词编年笺注》为“传世之作”。

先生治史，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他努力探索中国古代特别是宋辽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和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重大课题。他一生出入于宋辽金史特别是宋史的各个领域，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推动宋辽金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另外，先生在历史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先生的学术著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全集》具有“卓然不可磨灭”的历史品格。

先生的著作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关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他开始进入史学领域之时，正值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先生晚年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把两宋的境遇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境遇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他正是怀抱着这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自觉地将毕生事业融入国家、民族和命运之中。他的学术生涯从陈亮研究起步，以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时代精英以及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着力最多的研究对象。先生的爱国激情和济世情怀，使他的著作具有格外感人的力量。

先生治史，非常注重实证精神，其著述兼具“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力倡“四把钥匙”之说，将目录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视为治史的入门津要，使众多弟子受益终身。先生治学十分重视史料的考证辨析，晚年曾多次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正名，他认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